

乔治·爱略特作品中的阶级与无政府状态

杜海霞

内容摘要：阶级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身份和文化形式的基础，更是“英国性”的突出表征之一。作为英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之一，乔治·爱略特在其作品中体现出她对英国的阶级文化的深刻认知。爱略特虽然很少直接在作品中描写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但是她同样意识到贵族、中产阶级、劳工阶层三个阶层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他们各自文化弊端，并希望通过寻找异己分子来打破阶级壁垒、改造以阶级为特征的文化。爱略特的这一观点与阿诺德的文化观点不谋而合。

关键词：爱略特；阶级文化；无政府状态；异己分子；“英国性”

作者简介：杜海霞，文学博士，新乡医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小说及文论研究。

对大多数维多利亚人来说，阶级是个实实在在的概念，是社会身份和文化形式的基础，是一种深层结构。马丁·休伊特（Martin Hewitt）指出，“阶级成为19世纪的英国的标志性特征：多样化的阶级身份出现了，英国人从阶级视角看待当时的社会，对阶级关系忧心忡忡，到阶级中寻找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动机，成为通行做法”（Hewitt, 2004）³¹⁸⁻³¹⁹。用阶级的观点描述英国社会，这种做法始于1819年，在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出生的年代，关于阶级的观点还是一种相对比较新颖的认识社会分层的方式，而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一词则始现于1813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大致形成和发展于1770至1840年之间，这也是工业革命和社会重组的重要时期。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将英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贵族、中产阶级、劳工阶级。三者各有其特点和弊端，分别被称为“野蛮人、非利士人、群氓”（barbarians, philistines and populace）（阿诺德，2002）⁸¹。他认为贵族阶级昏庸无能、不思进取，死守着社会等级来维护自身的优越地位；中产阶级是市侩之辈，他们沉湎于金钱的贪欲和物质的享乐之中，既漠视高尚的文化，又缺乏道德的庄严；而工人阶级是群氓，粗俗堕落。爱略特曾经阅读过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

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对阿诺德的这一观点并不陌生 (Eliot, 1985a)⁹⁸。爱略特虽然很少直接在作品中描写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 但是她同样意识到这三个阶级的文化弊端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并希望通过寻找“异己分子”(*aliens*) (阿诺德, 2002)⁸⁴, 也就是那些来自上述阶级, 但同时克服上述阶级缺陷的人物, 来打破阶级壁垒, 改造阶级文化。

一、品位败坏的贵族阶层

首先, 爱略特抨击了贵族阶级的文化品位。爱略特虽然是中产阶级的一员, 但是随着声名鹊起, 她与贵族的接触明显增多, 伦敦最优秀的贵族经常来拜访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 她甚至还接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公主们参加晚宴的邀约 (Eliot, 1985c)²⁸⁵, 所以她对贵族的文化品位略知一二。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指出, “一切文化实践和对文学、绘画或音乐的偏爱, 都与受教育的程度及社会出身密切相关” (Bourdieu, 1977)²⁶⁰。“高贵”似乎是贵族阶级的文化标签, 也是贵族阶级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 但是爱略特却看到掩藏其背后的野蛮和堕落。正如理查德·奥尔提克 (Richard D. Altick) 所言, “这些社会寄生虫这样打发时间: 他们在保护完好的猎场射猎雏鸡, 值时尚的伦敦社交之季, 在小镇的庄园闲逛, 那里充斥着只有不计其数的金钱才能买来的招摇、败坏的品位” (Altick, 1973)²¹。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 中通过犹太音乐家克莱斯默 (Klesmer) 的着装和音乐品位对贵族阶层予以嘲讽。19世纪美国作家詹姆斯·库珀 (James Cooper) 认为, “得体” (decorum) 是“英国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英国是一个讲究举止得体的国度。我会选择‘得体’一词来形容这个国家, 因为它最接近英国的民族特性” (qtd in Langford, 2000)¹⁵⁷。英国绅士的着装可能最能体现“得体”这一民族特性, 而犹太音乐家克莱斯默的出场与不苟言笑的英国绅士形成鲜明的对比:

地道英国绅士的强项在于体形和衣着具有潇洒自如之风; 他反对服饰上的花里胡哨, 他也反对面露神灵附体之色。试想在一个集会上, 男人们清一色有教养的英国人的常规模样, 这时克莱斯默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场了: 高顶礼帽下, 一波又长又密的头发向后披散开, 极不协调, 那帽子就像是为搞笑而戴上去的; 再下面则是棱廓分明而端正的眉目, 胡子刮得光光而有力的嘴和下巴; 他身材瘦长, 衣着本已不合英国样式, 加之其用意明白突出, 于是更见糟糕。 (Eliot, 1984)¹⁵³

在这里“爱略特拿他身上的幽默成分来评定英国上流社会的庸俗无知及其对衣着举止得体的热衷讲究所表现出来的自鸣得意的愚蠢”（利维斯，2009）¹⁵⁴。

克莱斯默是可以和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雅格布·路德维希·门德尔松（Jakob Ludwig Mendelssohn）相提并论的犹太艺术家，他对英国贵族文化的批判不仅体现在着装上，还体现在音乐欣赏方面。“19世纪的英国一直被指责为是最没有音乐感的国度”（Byerly, 1989）¹⁰，英国音乐的“英国性”永远是一种正在被抹去的能指（Smyth, 2008）¹⁷⁶。格温德琳（Gwendolen）是没落贵族的一员，她一直是全家的掌上明珠，是母亲、妹妹、家庭女教师和女仆们服侍的对象，因而她把自己的快乐视为天经地义。在一次社交聚会中，她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家纷纷要求她一展歌喉来助兴。格温德琳并没有拒绝，因为音乐和法语一直是她比较自信的才能，她没有紧张，选择演唱最拿手的意大利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Vincenzo Bellini）歌剧中的咏叹调。虽然她的演唱得到在场大多数贵族的赞美，但是克莱斯默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她选曲不当，说她的“曲调趣味低下”，表现的文化品位既幼稚又虚张声势，“没有深切而神秘的激情的爆发——没有冲突——没有对大千世界的感受”（Eliot, 1984）⁴³。克莱斯默认为曲子会让人变得渺小，这些正体现出他对长着平庸耳朵的英国人的嘲讽以及对英国文化的批判（da Sousa Correa, 2003）¹³¹。格温德琳的选曲也代表着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普遍品位，因为“品位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群体关切的产物”（Garson, 2007）³³⁹。在座的宾客更喜欢格温德琳的音乐而不是克莱斯默的表演，他们一致认为克莱斯默的表演过于冗长，这一点显示出英国上流社会对音乐的无知。虽然英国贵族对音乐一无所知，但是对赌博这种游戏却情有独钟。爱略特就借用德国温泉疗养地的赌场来进一步批判上流社会的病态文化。不同种类的欧洲人在这个温泉赌场齐聚一堂，英国贵族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充斥着“毒气弥漫”的氛围，“他们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消极的表情，好像服用了某种草药使他们的大脑服从单调的动作”（Eliot, 1984）³⁷，从而体现出一种“文化衰败”（Stone, 1998）³²。

《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也写到贵族败坏的品位。医生利德盖特（Lydgate）出身没落贵族，他的堂兄弟利德盖特上尉是从男爵的儿子，在拜访利德盖特时尽显贵族的堕落。他是一位“无聊透顶的纨绔子弟”，发型总是弄得“怪模怪样”，不管谈论什么，他总喜欢“假充内行，胡诌一通”，像一头“自命不凡的蠢驴”（爱略特，2006）⁵⁴⁹⁻⁵⁵⁰。他谈吐粗俗，不拘小节，根本不把中产阶级的文明礼貌放在眼里。就是这样一位毫无文化品位的人却得到米德尔马契名媛的好评，

其中就包括中产阶级出身并具有等级观念的罗莎蒙德 (Rosamond)。罗莎蒙德误认为利德盖特上尉是地地道道的绅士。在米德尔马契期间，利德盖特上尉和漂亮的罗莎蒙德打情骂俏，有说有笑。他还和怀有身孕的罗莎蒙德外出骑马并导致其流产。而利德盖特的伯父高德文爵士在得知利德盖特被债务纠缠时，也拒绝伸出援手，还指责利德盖特弄虚作假，生活奢侈。

爱略特在《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中也揭示出贵族势力的衰败。土地贵族阶层的代表特兰姆太太 (Mrs. Transome) 与丈夫的婚姻形同虚设。特兰姆先生软弱无能，整天只知道摆弄昆虫标本。他们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缺点，是个未完全开化的野蛮人。他喜欢结交一些坏朋友，整天花天酒地，仿佛小型的卡列班 (Caliban)。早年间在与另一家族争夺田产继承权之时，为了弥补婚姻的不幸也为了在官司上取得胜利，特兰姆太太与律师杰明 (Jermyn) 有了私情，并生下私生子哈罗德 (Harold)。特兰姆太太本指望哈罗德长大后能有所作为，结果却失望之极，因为从东方发财回来的哈罗德只是一位唯利是图、追名逐利的伪激进派。他对母亲冷漠无情，还试图从杰明手中夺回田产的管理权，导致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几近破裂。

二、庸俗伪善的中产阶级

在抨击贵族腐化生活的同时，爱略特还指向中产阶级的庸俗、伪善、“狂热的物质主义和对地位的饥渴” (Levine, 2001)²²⁰。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约占总人口的 15%-20%。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在《1789—1848：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一书中，曾经用“缺乏教育、讲求实用”来描述这个阶层 (霍布斯鲍姆, 2014)²¹⁴。阿诺德将英国中产阶级命名为“非利士人”，将他们庸俗狭隘的市侩习气称作“非利士主义” (Philistinism)。他还认为英国民族的核心是中产阶级，市侩习气是大不列颠民族的一个特征。爱略特在评论文章《德国生活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 中表达过自己对中产阶级的看法。爱略特首先借鉴德国民俗家威廉·海因里希·冯·里尔 (Wilhelm Heinrich von Riehl) 对社会分层的观点，特别是对中产阶级的论述。里尔称中产阶级为 Philister (即 Philistine)，他认为

非利士人除了一己私利之外对社会利益和公众生活漠不关心，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没有切身的感受，除非它们影响了自己的舒适和发达 (它

们为其提供了满足虚荣心的机会和享乐的原材料)；他没有社会和政治信条，总是接受当时最便捷的见解。他占据社会阶层的大部分席位，是判断开明公众时非理性和愚蠢的主要因素。(Eliot, 1963)²⁹⁶⁻²⁹⁷

爱略特将里尔的定义进行扩展，并直接揭示出中产阶级庸俗的本质，“我们可以想象非利士人代表一种精神：总是从较低的角度判断事物，从较狭隘的角度判断国家事务，毫不犹豫地从世俗的角度衡量宇宙的优点”(Eliot, 1963)²⁹⁷。爱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中就刻画了一位英国商人议员布尔特先生(Mr Bult)。他的名字可以让读者联想到英国的绰号“约翰牛”(John Bull)。爱略特嘲讽他“有着健康英国人那种可靠性，红光满面”(Eliot, 1984)²²³，他的外表足以反映中产阶级富足的生活，而他的夸夸其谈也体现出英国中产阶级重商重利的气质。爱略特在《佛洛斯河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也批判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用“微贱”一词来形容：

(他们)没有崇高的原则，没有浪漫的幻想，没有积极的、自我牺牲的信念替这种生活添上光彩；没有那种会引起痛苦和罪恶阴影的狂热来影响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中没有穷人那种原始粗犷的单纯，那种辛勤谦恭和廉价的劳动，没有那种替农民生活添上诗意的对自然现象的幼稚解释。(爱略特, 2000)²⁵⁰

杜黎弗太太的姐妹是当时中产阶级的代表。爱略特将她们刻画为一种“堕落的、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物种，没有同情心也不需要同情心”(Bellringer, 1993)⁵⁰。在杜黎弗一家破产时，家庭物品也难逃被拍卖的厄运，而购买这些物品的顾客正是杜黎弗太太的姐妹，在这危急时刻，家人不但没能倾囊相助，反而认为这是家族的耻辱，还挑三拣四，处处展示市侩的商业头脑。格莱阁姨妈(Aunt Glegg)宁可把资金用作投资收取利息，也不愿出资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普莱特太太(Mrs Pullet)出场时的眼泪和着装则暗含了爱略特对中产阶级伪善的抨击。普莱特太太为邻居的去世感到伤心不已，在下车之前还要再流一滴眼泪，她的感伤更揭示出爱略特对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嘲讽，“一个衣着入时的妇女的悲悼是多么令人感伤呀！眼前便是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高度文明给情感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从非洲丛林的霍腾托人到戴着亭阁式女帽的妇女，期间要攀登多少个等级”(爱略特, 2000)⁵⁸。非洲的霍腾托人处于人类进化链条的底端，而现代妇女则占据较高的位置，处于链条顶端的普莱特太太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复杂和高级的情感。她

穿着硬麻布大袖子衣服，每条胳膊上戴几只手镯，头上戴着建筑物式的帽子，在表达悲伤时还要注意一下衣着和仪表，使她的悲伤完全成为一种表演，她哭泣的目的只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经济地位，因为她有的是金钱和时间使其他事情都变成可敬的，这也说明中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其实只是一种关注和赞美自我的行为（Tompkins, 1932）¹⁰³。她的着装也只是为了在姐妹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感，因为姐妹之间一直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进行攀比。在这里，中产阶级的虚情假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产阶级的伪善还体现在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身对地位和金钱的渴望。格温德琳的姨夫加斯科因（Mr. Gascoigne）是一名牧师，在格温德琳一家落难时，他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拿“责任”为借口劝说格温德琳嫁给当地的贵族格朗古。虽然他听说过有关格朗古人品的流言蜚语（格朗古曾经拥有一位情妇和四名私生子），但是他并不在乎，一心期盼格温德琳攀上高枝，自己也能多捞些好处。他以其父亲的身份自居，劝说格温德琳打消顾虑，对自己和家庭承担责任，不希望她愤世嫉俗，而应该“具有宗教般的虔诚，温暖的人情味”，“我肯定你会发现婚姻是责任和爱的新的力量之源，婚姻是女人唯一的真正令人满意的领域。如果你和格朗古的婚事被愉快地确定下来，你会在地位和金钱方面得到巨大的提升，能使其他人受益”（Eliot, 1984）¹²⁷⁻¹²⁸。而这场世俗的婚姻给格温德琳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让她痛不欲生。可见，宗教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追求名利的障眼法，并为虚伪的中产阶级道德观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

三、无知和缺乏责任感的工人阶层

在指出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顽疾之后，爱略特还通过酗酒情节来批判工人阶级的无知和责任感的缺失。爱略特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不陌生，她曾借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宪章运动》（Chartism）中的词语来形容格拉斯哥工人的生活状况，“浓烟、低矮的房子、辛苦得到的工资、罢工和杜松子酒”（Eliot, 1985b）⁷¹。她目睹过曼彻斯特工人居住区中的街道和房屋，那里的条件比任何书上所描写的还要差得多。爱略特借《菲利克斯·霍尔特》中的叙述者表达过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同情，矿工在“矿井中双膝跪地前行”，“各个地方的棚屋和儿童都那么肮脏不堪，因为母亲们都把精力放在织布机上”（Eliot, 1972）⁴。爱略特虽然同情工人阶级，但是依然对他们的无知和缺乏责任感的弊端进行批判，这主要通过关于酗酒的情节体现出来。饮酒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

农业工人、卸煤工人和矿工看来，啤酒是任何体力劳动者不可缺少的饮料”（汤普森，2013）³⁶⁴。《菲利克斯·霍尔特》的开头就通过马车夫的视角聚焦煤矿工人的生活，矿工在呼呼大睡中度过白天的时光，起来后把大部分工资花在酒馆里，与互助俱乐部的工友们在一起消磨时光。酒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集会场所，“酒馆的形象由工人阶级饮酒文化的苦难所塑造，所以它意味着文明、理性、有责任感的公民意识的缺失”（Volkova, 2009）¹²³。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酗酒是一个普遍现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详尽描述过工人酗酒的普遍程度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及道德问题，“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恩格斯，1956）¹⁷¹⁻¹⁷²。

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正值第二次议会改革之后，而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工人阶级努力争取更多的选举权。小说背景主要聚焦于1832年议会选举时的暴乱事件，爱略特为此专门查看了1830年前后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小说中主人公哈罗德（Harold）打着激进派的名义希望在选举中为自己谋利，他的竞选助手约翰逊（Johnson）将工人阶级经常聚集的酒馆当成捞取政治资本的最佳场所。“酒馆并不是公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仔细斟酌公众意见的场所。”（Bentley, 2002）²⁷⁷他们贿赂欺骗选民，来争取工人阶级的选票。行贿纵酒是当时普遍的做法，“甜面包酒馆（Sugar Loaf）给工人们发酒券，引诱他们去竞选助威。法案公布后，招待就停止了……两个持对立观点的竞选人往往分摊这笔招待费”（Thomson, 1959）⁵⁸³⁻⁵⁸⁴。而当时的工人阶级是一群野蛮且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有酗酒的陋习，一旦兴奋起来行为就会失控。“大多数选民只关心更多的钱，只关心更多的酒，只斤斤计较一己之私不顾他人利益，根本不顾社会正义。”（Eliot, 1972）²⁴⁹阿诺德也曾经表示，工人阶级有可能成为暴民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自己的“运行轨道”，“爱在哪儿集会就在哪儿集会，想吆喝就吆喝，想推推搡搡就推推搡搡”（阿诺德，2002）⁴⁹。小说中的选民在酒精的催化下，开始离开酒馆的聚集地，转向公共街道，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带领下，转变为暴民，甚至导致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目前尚未见证据清楚表明有任何恶作剧的预谋。只有证据表明，人群中大部分人喝了酒兴奋起来。而他们的行为很难指望胜过在哄叫冲撞中聚在一起的猪牛的行为。”（Eliot, 1972）⁴³²小说中的另一位激进派成员霍尔特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Keating, 1971）²⁶，也是阿诺德笔下的“异己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出身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与中产阶级为伍，而是忠诚于劳工阶级，以当钟表匠谋生。他希望工人阶级能够获得权利，但同时

他认为，工人如果不改掉酗酒的毛病，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切都没有用处。“卡列班（Caliban）就是卡列班，即使你繁殖一百万个，他也只会崇拜拿着酒瓶的特林鸠罗（Trinculo）。”（Eliot, 1972）²²⁶ 他还这样批评工人的无知和酗酒：

一种是损害的力量——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毁掉已经做成的事物，浪费和破坏，恃强凌弱，撒谎争吵，乱语中伤，这是无知者的力量，这种力量永远做不出木凳，种不了土豆，你还以为它能有益于治理一个国家、制定合理审慎的法律、为千百人提供衣食住宅？无知的力量将和邪恶的力量导致同样的苦果，它会带来苦难。（Eliot, 1972）³⁹⁹

霍尔特同情工人阶级，认为政治权利应该得到重新分配，但是在这之前工人阶级需要培养理性和责任意识，即实现自我改造。因为在她眼里，“100个工人里有70个不清醒，70个里有一半只知道喝酒……另一半无知、卑鄙、愚蠢”（Eliot, 1972）²⁷⁴。他认为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改变无知的本性，也无法阻止罪恶和苦难的产生，唯有文化教育才能改造工人阶级。所以，霍尔特在小说结尾处开办学校，以期改变工人阶级无知的现状，并希望将权力交给拥有“知识、科技、诗歌、高度思想、感情、习惯、保留伟大记忆”（Eliot, 1963）²⁸⁵ 的最聪慧的阶级，因为无知的人掌管权力，只会导致邪恶。“如果他能说动这些人从酗酒中节省钱为孩子交学费，比起劝说贾斯丁（Garstin）和他的公司建学校来效果更大。”（Eliot, 1972）¹¹⁰ 在他看来，无知是一种疾病。如果孩子不接受教育的话很容易受到道德瘟疫的侵袭。酒精只能带来一时的快感，唯有教育才能有益于下一代，这种做法虽然收益缓慢，却能发挥持久的作用。可见，爱略特对激进改革持保留态度，她认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比通过激进的方式得到选票更为有效。

四、结语

考察完这三个阶级的文化，可以得出一个阿诺德式的结论：他们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无法承担国家的领导重任，因而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正因如此，爱略特在《霍尔特致工人阶级》（“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一文中号召各阶层从自己的社会位置出发，根据更为迫切的对国家的责任，把对本阶层利益的追求转变成对本阶层责任的追求，同时她还希望通过寻找“异己分子”，改造阶级文化。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LTICK R, 1973.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M]. NY: W. W. Norton.

BELLRINGER A, 1993. George Eliot [M]. Basingstoke: Macmillan.

BENTLEY C, 2002.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Felix Holt* [J].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24(3): 271-289.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BYERLY A, 1989. "The language of the soul": George Eliot and music [J].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1): 1-17.

DA SOUSA CORREA D, 2003. George Eliot, music and Victorian culture [M]. NY: Palgrave.

ELIOT G, 1963. Essays of George Eliot [M]. Ed, Thomas Pinney. London: Routledge.

ELIOT G, 1972. *Felix Holt*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ELIOT G, 1984. *Daniel Deronda* [M]. Oxford: Clarendon: 153.

ELIOT G, 1985a.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M]. Vol. VI. Ed, Gordon S. Haight. New Haven: Yale UP.

ELIOT G, 1985b.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M]. Vol. I. Ed, Gordon S. Haight. New Haven: Yale UP.

ELIOT G, 1985c. Selections from George Eliot's letters [M]. Ed, Gordon S. Haight. New Haven: Yale UP.

GARSON M, 2007. Moral taste: aesthetics, subjectivity and social power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M]. Toronto: U of Toronto P.

HEWITT M, 2004. Class and classes [M]// 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d, Chris Williams. Oxford: Blackwell.

KEATING P, 1971. The working classes in Victorian fi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LANGFORD P, 2000. Englishness identified: manners and character 1650—1850 [M]. Oxford: Oxford UP.

LEVINE G, 2001.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SMYTH G, 2008. Music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listening to the novel [M]. NY: Palgrave Macmillan.

STONE W, 1998. The play of chance and ego in *Daniel Deronda* [J].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53(1): 25-55.

TOMPKINS J, 1932. The popular novel in England [M].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THOMSON F, 1959. The genesis of *Felix Holt* [J]. PMLA 74: 576-84.

VOLKOVVA I, 2009. Public spaces and the political underworld in George Eliot's *Felix Holt, the Radical* [J]. George Eliot and George-Henry Lewes studies 57: 119-32.

阿诺德, 2002.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政治与社会批评 [M]. 韩敏中,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爱略特, 2000. 佛洛斯河磨坊 [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爱略特, 2006. 米德尔马契 [M]. 项星耀,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恩格斯, 195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霍布斯鲍姆, 埃里克, 2014. 1789—1848: 革命的年代 [M]. 王章辉,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利维斯, 2009. 伟大的传统 [M]. 袁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汤普森, 2013.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M]. 钱乘旦,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